

儒学叙事下的中国史

——以明治时期日本的汉文中国史著作为中心

黄东兰

内容提要 明治维新后,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两种中国史叙事模式,即文明-进步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前者依据进化史观,将中国历史描述为“停滞之史”;后者则将中国史纳入“东洋”诸民族竞争之史。本文通过对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等13部明治时期日本人用汉文编纂的中国史著作之文本分析,指出在明治史学中还存在着第三种叙事模式,即中国传统的儒家历史叙事。明治汉文中国史大都以中国史籍为“底本”,使用中国帝王年号、以春秋笔法叙事、基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叙述中国与周边的关系。那珂通世《支那通史》虽然采用了西方万国史之章节体,但是,其时空表述仍然体现了儒家传统的历史意识。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在讨论“明治维新”、“文明开化”等问题时,应避免落入西方近代学术体系的认识论窠臼。

关键词 文明-进步叙事 民族-国家叙事 儒学叙事 春秋笔法 华夷观念

黄东兰,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外语学部教授

引言

1868年的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文明模式的转换,即从以中国为师、接受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明,转向以欧美为师、接受西方的近代文明。在以“文明开化”为张本的近代化过程中,来自西方的近代历史观念和叙事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西方的历史叙事可以概括为文明-进步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两个类型,前者起源于欧洲启蒙时期的文明史观,将人类历史描述为由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而欧洲则是人类文明所达到的最高点。文明-进步历史叙事通过基佐的《欧罗巴文明史》、巴克尔的《英国开化史》和须因顿的《万国史》等著作传入日本^[1],对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

本文得到“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学术项目资助。

[1] Francois Guizot,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 Paris: Perrin, 1855. Henry Thomas Buck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New York: D. Appleton, 1870. William Swinton, *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 American Book Company, first published in 1870.

(1875年)等日本早期的启蒙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史学界,最早以文明史观叙述日本历史的是田口卯吉,他在《日本开化小史》(1877-1882年,1883年东京书林合刊本)一书中,按照人类进步与发展之普遍“法则”,描绘了一部从蒙昧到文明的不断进步的日本历史。

另一种是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叙事。兰克批判启蒙史学抽象地从整体上概括人类的历史,忽视了人类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下的活动,他强调应该重视“民族共同体”由弱小的民族集团演变为民族国家之历史。这一学说由兰克的弟子、长期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的里斯(Ludwig Riess)传入日本^[1],催生了日本的学院派史学。在1880年代末,随着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确立,民族-国家叙事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关于大和王朝起源的神话传说、以及江户时代具有神话色彩的国学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以天皇谱系为中心的皇国史叙述。官方叙述下“万世一系”的日本历史,是一部没有进步、也没有停滞和倒退的历史。

文明-进步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对近代日本的中国史叙述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按照文明-进步史观,中国是亚洲“专制”、“守旧”、“停滞”和“落后”的典型,与明治维新后进入西方“文明国”行列的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田口卯吉在《支那开化小史》(秀英社,1888年)中,以进化史观描述了两千年专制政治下停滞不前的中国历史^[2]。以甲午战争后“东洋史”的创立为标志,民族-国家叙事成为中国史叙述的主流。以桑原鹭藏《中等东洋史》(大日本图书,1898年)为代表,中国史与突厥、女真、蒙古等“东洋”诸民族的历史一起,被纳入“东洋”或“东方亚细亚”的历史框架之中,从而成为适应日本对外扩张的“近代知识”^[3]。

与此相对应,以往关于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国史叙述的研究,基本上沿着两条思路展开。一条是通过批判近代日本历史叙述中的东方主义传统,揭示日本一方面在西方化的过程中自我东方化,一方面将中国等亚洲邻国归于“专制、野蛮”而凸现自身之“文明国”地位^[4]。另一条思路是从学术史角度,或正面评价东洋史学摆脱儒学的影响、在欧洲学术的影响下成长为一门以中国及其周边民族之历史、语言等为研究对象的“近代”学科,或批判东洋史学作为“帝国知”在日本的对外扩张中所起的作用^[5]。

笔者认为,在日本迈入“近代”过程中,除了上述文明-进步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影响下的中国

[1]里斯(1861-1928)在26岁时受聘为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讲师,长期担任世界史讲座,讲述日尔曼等欧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以及向欧洲以外地区扩张势力的历史。里斯特别强调民族国家在历史叙述中的重要性,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通过揭示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由不同民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Ludwig Riess, *A Short Survey of Universal History: Being Note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Literature College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Fusambo, 1899, pp.2-6.

[2]拙文:《一部缺失“开化”的“开化史”: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与近代日本文明史学之困境》,《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3]参见拙文:《书写中国:明治时期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中国叙述》,拙编《再生产的近代知识》,《新史学》第4号,〔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4]S.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陈纬芬《自我的客体化——近代日本的“东洋”论及藏匿其中的“西洋”与“支那”》,《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8号,2001年。子安宣邦《“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近代日本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东京〕藤原书店2003年版。李圭之《近代日本の东洋概念——以中国与欧美为经纬》,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与研究中心,2008年。

[5]杉本直次郎《本邦に於ける東洋史学の成立に就いて》,《歴史と地理》第21卷第4号,1928年。青木富太郎《東洋学の成立とその発展》,〔东京〕萤雪书院,1940年。榎一雄《支那史から東洋史へ》,《榎一雄著作集》第9卷,〔东京〕汲古書院,1994年。旗田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伝統》,《歴史学研究》第270号,1962年。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东京〕青木书店1976年版。奈須惠子《中等教育における東洋歴史の登場》,寺崎昌男編《近代日本における知の配分と國民統合》,〔东京〕第一法規出版社1992年版。吉泽诚一郎《東洋史学の形成と中国——桑原隲藏の場合》,岸本美绪編《東洋学の磁場》《“帝国”日本の学知》第三卷,〔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版。

史叙述模式外,还存在着第三种历史叙述模式,即以儒家史学传统为基础的儒学叙事。这种历史叙事可以概括为以儒家史学的正统史观、道德史观和华夷观念为依据,以春秋笔法书写历史。明治维新后,虽然传统的儒学叙事受到福泽谕吉、田口卯吉等启蒙学者的抨击;以重野安绎为代表的考证学派亦摈斥儒家史学的“劝惩主义”立场,融会清朝考据学和西方实证史学的方法,从事《大日本编年史》之编纂^[1]。然而,正如本文所述,儒学叙事下的中国史叙述在明治日本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其影响直到甲午战争之后仍然依稀可见。

明治政府仿效西方教育制度,于1872年颁布新学制,实行义务教育,历史也由此成为中小学的教科之一。以文部省编纂出版的小学历史教科书《史略》(1872年)〈支那〉部分为嚆矢^[2],日本出版了许多以“汉史”或“支那史”为标题的中国史通俗作品(以下简称“明治中国史”),绝大多数是中小学或私塾的教科书,也有一些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历史读物。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中国史著作大部分用日文撰写,也不乏用汉文撰写者。其中相当一部分在体例、内容和叙事风格上深受《史记》、《资治通鉴》、《十八史略》等中国史籍的影响,承继了儒家的正统史观和道德史观^[3]。

为什么在明治政府大力推行“文明开化”之时,仍有日本人用汉文撰写中国史? 明治汉文中国史在体例、修辞和时空表述上,与文明-进步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下的中国史叙述有何不同? 汉文中国史的编者在涉及元朝出兵日本等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时,是援引中国史籍而书“征日本”,还是书“犯日本”以凸现日本的民族认同? 其历史叙述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意识? 作为笔者关于明治日本中国学的重要分支“东洋史”的研究之一部分,本文通过明治汉文中国史的文本分析,考察其知识来源、修辞特征和历史意识,探讨儒家传统史学对明治日本中国史叙述的影响^[4]。

一、明治汉文中国史及其知识来源

加藤周一曾经指出:“理解文明就是理解历史”,日本在长期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养成了一种习

[1]家永三郎:《日本史学史》,东京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小泽荣一:《近世史学思想史》,[东京]吉川弘文馆1974年版。永原庆二:《20世纪日本的历史学》,[东京]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大久保利谦:《日本近代史学之成立》,《大久保利谦著作集》第7卷,[东京]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

[2]《史略》由《皇国》、《支那》和《西洋》三个部分构成,分别为日本史、中国史和西洋史。《史略》的三分科法成为其后日本史学研究中日本史、东洋史(前身为支那史)、西洋史三分科制的雏形。从“支那史”诞生之日起,中国史作为一国之史而被纳入近代知识体系。甲午战争后,中国史又与朝鲜、蒙古等中国周边地区的历史,被纳入“东洋史”的框架之中。至此,中国史由江户时代的普遍史一变而为国别史,再变而为区域史之一部分。

[3]以1872年文部省编纂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史略》的《支那》部分为例,它承袭《十八史略》的叙事风格,从三皇五帝、夏商周至“今帝”同治帝,按朝代、帝王顺序,叙述皇位传承、内外战争等内容。该书以春秋笔法叙事,称周武王灭殷为“伐”,称忽必烈出师日本为“伐我日本”。称崇祯自缢身亡为“思宗崩于万岁山”(文部省编纂发行《史略》《支那》部分,海后宗臣编《日本教科书大系》近代编,第18卷,《历史》(一),讲谈社1963年版,17页、23页、24页)。除了称日本为“我日本”以外,犹如出自中国人之手。

[4]明治时期日本人撰写的包括教科书在内的中国史通俗书籍数量很多,内容亦较为复杂。概言之,明治15年之前以元代曾先之《十八史略》为原型的王朝兴衰史为主流。明治10年代,受欧美文明史观的影响,有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秀英舍,1883-1887年)和青山正夫《支那文明史略》(文海堂,1889年)等文明史著作问世。甲午战争后,“支那史”逐渐为“东洋史”所取代。关于文明史和东洋史的历史叙述,笔者已另外撰文,在此不加赘述。参见拙文《東洋史の時空:桑原隲藏〈中等東洋史〉に関する一考察》(《愛知県立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地域研究・国際学編)第42号,2010年)。《书写中国:明治时期日本支那史·東洋史教科書的中国叙述》(拙编《再生产的近代知识》,《新史学》第4号,[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吾国无史乎:从支那史、东洋史到中国史》(孙江·刘建辉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一辑,三联书店2013年版)。《一部缺失“开化”的“开化史”: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与日本近代文明史学的困境》(《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惯,即通过学习中国历史来吸收中国的文化^[1]。在日本江户时代以儒学为主的藩校教育中,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武士子弟自幼熟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汉土史籍”,以中国王朝之兴衰、政治之得失作为将来为政之借鉴。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儒官(塾长)佐藤一斋曾经对习史的步骤作过如下说明:“读史之法在明治乱兴亡之轨迹,考历代之制度文物,知地理之沿革”^[2]。这里所说的“史”既不是日本历史,也不是今天人们所理解的中国这一民族国家地理空间的历史,而是超越地理概念上的“中国”空间、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文明之历史。在昌平坂学问所的必修科目“史科”中,“汉土史料”列于“本朝史料”之前^[3],原因亦在于此。由于接受儒家传统经史教育的武士阶层,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一样,置身于儒学知识共同体之中,无论是近世史学的始祖林罗山,还是集江户史学大成的新井白石,其历史叙事都继承了以中国正史为代表的儒家史学传统。

明治维新后,日本民众阶层中出现了前所未有“汉学热”。新政府推行“四民平等”和教育普及政策,在政府“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徒”的方针下,平民子弟在教育机会上不再受到限制。对于民众而言,来自中国的四书五经、《史记》、《资治通鉴》这些统称为“汉学”的学问是“至高无上之学”^[4],民间涌现了“汉学热”。各地设立了许多以农民子弟为对象的乡学,讲授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乡学成为平民子弟修习汉学的主要场所。在文化中心东京,涌现出许多被称为“汉学塾”的私塾,这些私塾以儒家的修齐治平为教育宗旨,教授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5]。以一家名为玉琴舍的汉学塾为例,其办学宗旨的第一条即为“成德达材,进而善人,退而善己,是学问之主旨,而其本在忠孝。忠孝之义明,而士之节操立焉,是进修之次序也。古之忠臣孝子,皆自至顺之志,而发为至烈之行,学者审诸”^[6]。可见,明治初年诞生的汉学塾承袭了江户时代藩校儒学教育宗旨。

在明治政府导入的西方近代学科体系下,西学在教育体系中占有很大比例。按照《学制》的规定,正规学校的学生必须修习地理、历史、数学等许多课程,江户时代藩校从素读、独看、讲释到会读、作文的传统教学方法已经无法延续;曾经作为各地藩校教材的《左传》、《史记》、《资治通鉴》、《日本政记》、《日本外史》等著作,也由于篇幅过长,难以用作学校的教科书。正如龟谷行在藤田久道《汉土历代十八史略 附三史略》序文所说:“时课大率修西学,不能专力于汉籍,所以有待于略史也。此编荟萃全史,隐括提要,凡古今治乱人物得失,了如掌纹。可以为史学之梯航”^[7]。在“简便捷速之世运”之下,元代曾先之编纂的一部童蒙课本《十八史略》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中国史教科书。《十八史略》节录《史记》到《新五代史》的十七种正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按编年体例,简述从太古、三皇五帝到南宋历朝历代的事迹。明朝兴学,官学和私塾教育得以发展,民间对普及性史籍的需求也大为增加,出现了诸多《十八史略》的改写版本。其中由陈殷注释、王逢标题、刘刻点校的七卷本(明正统六年,1441年刊)最为流行。《十八史略》在室町时期传入日本,江户时代由于幕府奖励儒学而广受欢迎,陈殷注释的七

[1]丸山真男、加藤周一:《翻译と日本の近代》,[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第一刷,2004年第7刷,第66页。

[2]《佐藤一斋全集》第一卷,[东京]明德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页。

[3]在江户时代的武士教育中,日本史教育长期不受重视,以昌平坂学问所为例,直到1868年学科改制,将原有的学科改为经科、汉土史料、本朝史料、刑政科4科后,其中的本朝史料课程才正式以《六国史》为教材讲授日本历史。大久保利谦《近世に於ける歴史教育》,史学会编《本邦史学史論叢》,[东京]富山房1939年版,第1246-1247页。

[4]川村肇《在村知識人の儒学》,[京都]思文閣1996年版,第68页。

[5]神边靖光分析明治5年(1872年)的《开学愿书》后发现,仅1872年一年之中,东京就有23家汉学私塾开业,其数目远远多于教授“英学”(14家)和“皇学”(2家)的私塾(神边靖光《明治初年の東京府の漢学塾——〈明治五年・開学願書〉を中心に》,幕末維新时期汉学塾研究会、生马宽信编《幕末維新时期漢学塾の研究》,[広島]溪水社2005年版)。

[6]同上,第300页。

[7]藤田久道·增田贡校正《汉土历代十八史略 附三史略》卷之一,龟谷行序,[东京]同盟书馆1879年版。

卷本《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成为各地藩校普遍使用的教材。在明治维新以后的20多年间,该书仍被许多中学选为教材^[1]。明治年间,七卷本《十八史略》于明治三年首次再版,其后至明治20年代刊行的各种《十八史略》注释本多达有50余种。大多用作“童蒙之课本”或“诸府县之教科书”^[2]。

除了翻刻既有的《十八史略》之外,从明治初年起,还有许多由日本人撰写的中国史的略史著作问世,无论是由官方还是由民间出版,无论是以日文还是以汉文编纂,书名大多冠以“汉史”或“支那史”。笔者目前收集到自明治9(1876)年至32(1899)年共13部(参见表1)汉文中国史著作,除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外,大多鲜为人知,在近代日本中国学研究中亦无人关注。

表1 明治期汉文中国史书物一览表

	编者	书名及卷数	出版事项	备考
(1)	宫胁通赫(1835-1914,地方史研究家)	《续十八史略读本》5卷	东京:山中市兵卫刊行,1876年	元初~清同治朝。“编次元明清三代,以续曾氏十八史略”。
(2)	林正躬(号恭卿,生卒年不详)	《清国史略》3卷	京都:竹岡文祐刊行,1876年	清初~乾隆朝。“清二百年之隆替得失、…皆可以备我之殷鉴。亦不特便初学也”。
(3)	石村贞一(1839-1919,号桐荫、历史学家,曾在教部省和陆军省编纂佛教史与战史)	《元明清史略》5卷	东京:东生龟治郎刊行,1877年	元初~清光绪朝。“使童蒙知读史之端绪”。
(4)	增田贡(-1899),号岳阳,田中藩藩士,维新时任该藩大参事	《清史掣要》6卷	东京:龟谷行刊行,1877年	清顺治朝~同治朝。姚培谦·张景星《通鑑攬要》之续编。“庠序之教、必從节史”。
(5)	冈本监辅(1839-1904),号韦庵,德岛藩农民出身,曾赴库页岛探险,后任德岛县立中学校长	《万国史记》4卷(亚细亚史)第二(支那记)	东京:内外兵事新闻局刊行,1879年	上古~清同治朝。“欲使蒙士博通万国事绩,民情风俗”。
(6)	藤田久道(生卒年不详)编,增田贡校正	《汉土历代十八史略 附三史略》7卷(别名《汉土历代二十一史略》)	东京:同盟书馆,1879年	太古~清光绪朝(内容节录《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十八史略》等。清代部分抄录增田贡《清史掣要》)。
(7)	增田贡	《满清史略》2卷	东京:铃木义宗刊行,1880年	清初~同治朝。“治乱之鉴”。
(8)	佐藤楚材(1801-1891)、号は牧山、尾张藩出身之汉学家,藩校教授,维新后任斯文学会讲师。	《清朝史略》11卷	甲府:温故堂,1881年	清初~同治朝。西村茂樹序(1879年)。“以便初学之讲读”。
(9)	諸理齋编,林厚德后点、增补(号東園,1828-1890、德岛藩士,维新后历任民政部官権判事、浜松县令等职)	《通鑑集要》11卷(原著10卷、第11卷《明纪》为林厚德所增补)	东京:石川治兵卫刊行,1881年	三皇五帝~明末(“原本至元终。余不揣浅陋,补明以为一卷”)
(10)	石村贞一、阪上成美(生卒年不详)	《统纲鉴精采》4卷	大阪:松村九兵卫刊行,1883年	明初~清光绪朝。“为初学之便”。
(11)	那珂通世(1851-1908),盛冈藩士,庆应义塾毕业,历任千叶师范学校校长、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等	《支那通史》4卷(5册)	东京:大日本图书,1888-1890年	太古~清(止于南宋,元以后部分未刊)。“初学之徒,或得由以察我邻邦开化之大势矣”。
(12)	統敬(生没年不详)编,統简订、重野安绎、統豊德阅	《汉史蠡海》3卷	佐仓町:秋锦山房,1889年	太古~清同治朝。“为儿童取其便耳”。
(13)	石村贞一、河野通之(1842-1916,仙台藩医之子,师事冈千仞,维新后入陆军省,为汉诗文团体旧雨社成员)	《最近支那史》2卷	东京:林平次郎刊行,1899年	元初~清光绪朝(甲午战争)。“时世愈近,鉴戒愈切”。

从表1(备考)栏中的“初学之便”、“以便初学之讲读”等文字可见,大部分汉文中国史乃是为私塾的中国史课程而编写的教材。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第一卷在1889年通过了文部省的教科书审查,

[1] 乔治中:《明代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乔治忠《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南开学报》2001年第1期。

[2] 中山步:《明治初期《十八史略》版本の特徴と問題点》,《二松学舎大学人文論叢》第64輯,2000年3月,156-158頁。

[3] 《師範学校・尋常中学校・高等女学校検定済教科用圖書表》(自明治19年至明治31年),文部省编纂发行。

成为官方认可的历史教科书^[1]。《汉史蠡海》序言称：“上自尧舜氏下至清氏、数千年间之事编为若干卷，曰汉史蠡海，盖为儿童取其便耳。……初学之徒、苟熟此编更进行、则庶几乎不失其方针矣”（[12]〈校订者序〉）。《续十八史略读本》的作者官胁通赫在该书序言中写道：“编次元明清三代、以续曾氏十八史略”。石村贞一在《元明清史略》自序中说，编纂该书的目的乃是“使童蒙知读史之端绪”。

本文考察的13部汉文中国史中，5部为从太古到明代或清代的通史，8部为断代史（元明清史、明清史或清史）。其中明治10年（1877年）以前出版的有2部，明治10年代为8部、明治20年代为2部、明治30年代为1部。值得注意的是，汉文中国史的出版为数最多的明治10年代，正是日本“文明开化”的鼎盛时期，无独有偶，《十八史略》各种注释本的出版顶峰也在这一时期^[2]。这一现象说明，人们对“汉史”的兴趣并没有被轰轰烈烈的西化大潮所吞没。如表1所示，13部汉文中国史中，在甲午战争结束四年后的1899年，仍有日本人编写的汉文中国史问世。《最近支那史》的编者之一石村贞一在该书的跋文中写道：“夫本邦之与支那也，自古交通，风俗人情，略相类似。而至近代之事，则最与我之今日关系极多。盖时势愈近，则关系愈切。……此书凡四易稿而成，学者读之，则不啻详支那近世事情，亦可以得窥亚细亚大陆形势沿革之一斑”（[13]卷二下，〈跋〉）。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作者不仅关心中国往昔的历史，更关心与日本的国运密切相关的中国之现在。

关于明治汉文中国史著作的编者，如表1“编者”栏所示，凡是生卒年可考者，皆出生于江户时代；生卒年份不详者，从书籍出版年代推知当在明治之前出生。其中既有佐藤楚材和那珂通世等著名学者，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儒者，他们自幼接受儒学教育，具有很高的汉学素养。石村贞一在《元明清史略》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予少时喜读史。史之要领关键，今犹能成诵者，得于史略者多矣”（[3]〈自序〉）。这里所说的“史略”，即《十八史略》。如后文所述，绝大多数汉文中国史在体例和内容上受到《十八史略》的影响。

明治汉文中国史中，除那珂《支那通史》在政治史之外兼述典章制度、文化风俗外，皆以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为主线，内容主要由政治史和军事史构成。其历史知识皆来自《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中国史籍。尤其是《十八史略》、薛应旂《宋元通鉴》、吴乘权《纲鉴易知录》、旷敏本《鉴撮》等元明以后的通俗历史读物，为许多明治汉文中国史竞相模仿的对象。由于当时尚无官修的清朝正史，清代部分大多依据《三朝实录》、《夷匪犯境录》、《粤匪纪略》等官方、民间史料。官胁通赫在《续十八史略读本》的凡例中写道：“元明清史乘及本邦所传诸书，参考录之，又有直就清人质者矣”（[1]凡例）。

就内容而言，13部明治汉文中国史中，除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外，几乎都抄录或摘录《史记》等正史以及在正史基础上编写的《资治通鉴》、《十八史略》等编年体史籍。据石村贞一《元明清史略》凡例所言，“是编皆就正史及各家记述，集句成篇，实无一字无来历。仍揭所据之书于卷首，以示非臆造”（[3]凡例），作者还在该书卷首“采集参证书目”开列了148种参考书目。佐藤楚材在《清朝史略》的序言中说：“称谓一从底本，不能齐整，一手订正，有所不暇及也”。“是编纪事，年月日或详或略，亦不一定，一从底本。其详则以其不可不详也，如纪发贼之乱是也”（[8]凡例）^[2]。

由于大多数明治汉文中国史按照“无一字无来历”、“一从底本”的宗旨，摘抄或节录原文而成，行文中难免出现空间表述上的错位。如关于明治以后中日两国的外交往来，《续纲鉴精采》中出现“日本国使副岛种臣等来京师，互换和约”之记述（正文上方另有眉批“与日本立和约”）（[10]卷四，第48页）。

[1]前引中山步：《明治初期〈十八史略〉版本の特徴と問題点》，第157页。

[2]该书卷首也列有74种书籍〈采集参证书目〉，其中包括作者的弟子从中国收集到的《明史》、《大明一统志》、《三朝实录》、《粤匪纪略》、《平粤纪略》、《京报》、《缙绅全书》等。

在《元明清史略》中,光绪帝被称为“今上皇帝”;关于何如璋一行出使日本,有如下记述:“简派驻扎日本钦差大臣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并随员,……赴日本呈国书”(3卷五,第60页)。《满清史略》中有“始通好日本”,“日本领事官来”等记述((7卷之下,第42页)。凡是涉及鸦片战争的文字,无一例外以清军为“我兵”、“我船”。以佐藤楚材《清朝史略》为例,有“英人炮击我三船,忽成粉漉”;“(英军)又进抵宁波,我军不战而走”(8卷之八,第15、20页)。如上所述,明治时期出版的汉文中国史的作者们更是直接以中国人的口吻叙事,以中国为“我”、日本为“彼”。

明明是日本人为日本读者编写的中国史著作,却以中国为“我”、日本为“彼”。这在今人看来颇为不可思议。为什么会出现此种现象?原因在于明治汉文中国史的编者继承了中国人常用的“直录原文”的修史之法。吕思勉在《中国史籍读法》中曾经指出,旧时作史者,只是根据所收集的史料加以编辑,在编辑时有一个共同的规则,即不将自己的意见加入史料之中,所谓“作文唯恐其不出于己,作史唯恐其不出于人。……直录原文,实为古人著书之通例”^[1]。《元明清史略》的作者石村贞一所说的“无一字无来历”,《清朝史略》的作者佐藤楚材所说的“一从底本”,并说自己“虽曰修之,其实编辑也”(3卷之一〈自序〉),即来源于中国人“作史唯恐其不出于人”的修史之法。这种看似食古不化的作史之法,如果放在中日长达千年以上的文化交流的脉络之中来看,其实不足为怪。它一方面反映出编者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在儒学知仍然受到尊崇的明治汉学界,以“无一字无来历”为标榜,无疑可以提高内容的权威性。

与大多数“直录原文”而成的汉文中国史不同,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不但文字出自编者之手,在内容、历史分期和叙述体例上亦有不乏创新。那珂出生于盛冈藩的武士家庭,自幼入藩校接受儒家教育,16岁就出任藩校教师。那珂那珂博闻强记,对中国典籍烂熟于胸。据其弟子桑原鹭藏回忆,那珂能背诵整部《四库全书提要》,还是日本唯一通读二千三百卷《九通》(《文献通考》《通典》等)的学者^[2]。《支那通史》中随处体现出那珂在中国史方面的造诣,然而,该书的历史知识并没有超出正史范围。例如,关于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与群臣商议尊号一事,书中写道:“追尊考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太古有号无谥,死而以行为谥,则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0卷二,第1页)。这段文字几乎原封不动地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二、史 体

在中国修史传统中,有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大体例。编年体以王朝、帝王为纲,按时间先后排列史事;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叙事,兼及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外国等;纪事本末体则以事件为中心叙事,便于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日本自8世纪初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问世后,历代正史都受中国正史中帝王本纪体例的影响,以编年形式记述天皇在位期间的主要事件,但是,自《续日本纪》以后,日本的正史中增加了贵族的传记^[3]。本文考察的13部明治汉文中国史著作按体例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仿《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十八史略》之编年体例,按朝代、帝王顺序叙述人物、事件,由于以正史帝王本纪为纲,所以不失《史记》的纪传体风格。提纲挈领,符合当人对略史的需要。13部汉文

[1]吕思勉:《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2]桑原鹭藏:《那珂先生を憶ふ》,1908年,前引《桑原鹭藏全集》第2卷,第561页。

[3]坂本太郎:《日本の修史と史学》,[东京]至文堂1958年版,第30页。

中国史著作中,除佐藤楚材《清朝史略》和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外,皆采用编年体。

第二类为纪传体,13部明治汉文中国史著作中,仅有佐藤楚材《清朝史略》采用此种体例。佐藤在该书的自序中,对当时流行的编年史体提出了如下批评:

始亦欲从编年之体,既而博览群籍,自名将贤相、文学遗逸、奇节伟行、磊磊轩天地,远迈前古者,不可弹数。余书生习气,老而不渝,不忍割爱。……夫笔削由己者,大有径庭。故不得以涑水、紫阳为准也”(8)卷一〈自序〉)。

此处涑水、紫阳分别指司马光(出生于陕州夏县涑水乡)的《资治通鉴》和朱熹(晚年别号紫阳)的《资治通鉴纲目》。从上面这段引文看,熟读中国史籍的佐藤显然并不推崇这两部编年体史书的代表。其原因有二,一是编年体以帝王为中心排列叙事,无法记载名将贤相、文人雅士的事迹;二是编年体“笔削由己”,易受史家个人偏好之影响。佐藤理想中的史书应该结合编年和纪传两大史体的优点,他设想自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元年(1616年)至光绪四年(1878年),清朝十一代帝王为“纪”,每人一卷,共11卷,其间穿插文臣武将等名人之“传”。佐藤在卷首《附传目录》中列举了纪晓岚、林则徐、曾国藩、段玉裁等194名文臣武将的姓名,计划在历代皇帝的本纪之后,以“附传”的形式记录他们的文功武略。然而,佐藤当初的计划并没有完成,他费时四载摘录而成的遑遑十一卷《清朝史略》中,实际单独列传的仅有曾国藩一人((8)卷十《穆宗纪》)。《清朝史略》是一部以清朝历代皇帝为中心的编年史。

第三类是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章节体。前面两类皆按王朝、帝王顺序排列重要史实,内容偏重于皇统承继和内外战争。与此不同,《支那通史》将自上古至明清之历史分为上世史(远古到周代)、中世史(秦到宋)和近世史(元明清)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分若干章节,各有标题,按章节叙事。《支那通史》主要由政治史和社会文化史两个部分构成,前者以正史的帝王本纪为纲,叙述王朝更替和内外战争;后者在各个时期的政治史之后另辟章节,分别叙述该时期的典章制度、社会风俗和宗教文化学术。如第一卷先秦部分,在春秋、战国政治更替之后,专辟《世态及文事》和《先秦诸子》两篇共十一章,介绍先秦时期社会风俗和文化学术。《支那通史》的政治史部分继承了《资治通鉴》以来编年体以帝王本纪为纲的传统,社会文化史部分则继承了《史记》的《表》和《朝鲜列传》、《匈奴列传》等四裔传部分。

《支那通史》在体例上受到了当时盛行于日本的欧美历史著作的影响。1870-1880年代,日本翻译或编译了大量欧美的历史著作,如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巴莱万国史》、基佐的《欧罗巴文明史》、勃克尔的《英国开化史》和须因顿的《万国史》。这些书籍有的根据圣经传说叙事,有的按照社会进化论叙事,历史意识各不相同,但是在大致都采用古代、中世、近世之历史分期,各个时期又分别设篇、章、节,按章节体叙事。受其影响,1880年代以后,日本人编纂的外国史教科书逐渐采用上古、中古、近世或上世、中世、近世之历史分期法^[1]。《支那通史》在叙述体例上有两大创新:第一,采用“上世”、“中世”、“近世”的历史分期,打破了《汉书》以降的断代史传统,开创了在中国史叙述历史分期的先河。关于那珂的历史分期的历史意识,将在后文探讨。第二,采用章节体叙事,便于根据各个时期的特点,在政治史之后记述典章制度、风俗文化、与外国之关系等内容,开创了不同于《资治通鉴》、《十八史略》等编年史著作的新的中国史叙述体例。

《清朝史略》和《支那通史》的史体折射出佐藤楚材和那珂通世不同的人生之路。佐藤楚材(1801-1891)出生于尾张藩,早年曾游学江户,后回到名古屋,任藩校明伦堂教授。由于在佐藤是当时著名的

[1]南塚信吾《日本における西洋史学と西欧中心主義の克服——明治期の“万国史”の教訓から》,《世界史研究所「ニューズレター」》第12号,2007年12月,第4页。

汉学家,维新后一度担任退位将军德川庆喜的侍讲,佐藤的汉文在当时受到很高的评价。他曾出任斯文学会讲师,指导汉诗文写作,还曾与俞樾等访问日本的中国文人墨客唱和诗文^[1]。那珂通世(1851-1908)出生于盛冈藩(位于现在的岩手县)的一个武士家庭,生父姓藤村,自幼入藩校学习儒家经典。他天姿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深受藩校教授江幡(后改性那珂)通高(号梧楼)的喜爱,9岁时被江幡收为养子,16岁时就出任藩校教师。1873年(明治6年)那珂22岁时进入庆应义塾,在福泽谕吉门下学习西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千叶师范学校、第一高级中学、高等师范学校,还在东京帝国大学担任兼职讲师,讲授中国历史^[2],白鸟库吉、藤田丰八、桑原鹭藏等日本第一代东洋史学者多出于其门下。从佐藤和那珂的经历看,二人都在江戸时代自幼接受儒学教育,如果没有明治维新,他们都有可能在藩校中度过各自的儒者人生。明治维新时,佐藤已年近七旬,政权交替并没有改变他的学术生涯,佐藤虽然对当时日本流行的编年史体提出了批评,却未能完成以纪传体形式编纂《清朝史略》的庞大计划,由于他的知识体系局限于传统的江户汉学,所以他对叙事体例的思考没有越出中国传统史学的编年、纪传两大体系。

那珂比佐藤年轻整整半个世纪,明治维新时他只有17岁,此后学习西学以及在师范学校任教的经历,使他有可能会接触西方历史教科书的章节体。《支那通史》结合纪传、编年两大史体的长处,并暗合纪事本末体,较之纪事本末体在运用上又更为灵活。因此,佐藤遇到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春秋笔法

在中国修史传统中,有名为“书法”或“义例”的修辞之法。源于孔子笔削《春秋》,故又称为“春秋笔法”。按照春秋笔法,人死有“崩”、“殂”、“卒”、“死”、“篡”、“弑”,争战有“征”、“伐”、“击”、“讨”,原王朝与周边政权之关系则有“来朝”、“入贡”、“入寇”、“来侵”,等等。史家在书写历史时,使用这些带有价值判断的词汇,凸现正统与僭伪、华与夷、善与恶、尊与卑、正与邪、君子与小人之别。

孔子作《春秋》,乃是以“微言大义”批判当时礼乐崩坏的现实,希望恢复“先王之道”,即古代圣贤制定的君臣、父子等伦理秩序。儒家所说的“道”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明道统之所在。区分政权之“正统”与“僭伪”,具体而言,使用某个王朝的年号,则意味着以该王朝为正统。第二,确立君臣、夷夏、内外秩序。孟子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说的是儒家“书法”的政治功能。朱熹指出:“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朱子语类》卷八十三)。第三,对过去的事件或人物进行善恶、正邪等价值判断,其标准即儒家的民本思想,帝王个人之德行顺民心则王朝兴,逆民心则王朝衰。

是否应该遵循儒家的“书法”和“义例”,是否应该使用春秋笔法?石村贞一在《元明清史略》的凡例中写道:“篇中或依原文,或加节略,故文体不一。然书殂书死,若书征讨侵伐等,悉用原文,不必有义例”(3)凡例)。在石村和阪上成美合编的《最近支那史》的凡例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夫元明清继承,则一抛正史,非必有义例。……元称本邦曰日本,明清曰日本或倭,又书入贡、来朝之类,皆失其实。然彼所称,今不敢变更。一抛原文。其书征讨侵伐亦然”(3)凡例)。二人批判中国史籍将日本视为中国的朝贡国的叙述“皆失其实”,他们强调,自己并不赞成中国史籍中使用“倭”、“入贡”、“来朝”等

[1]长泽孝三编:《改訂増補漢文學者総覧》,[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版,第205页。王宝平:《清代中日学术交流の研究》,汲古书院2005年版,第60页。

[2]三宅米吉:《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故那珂博士功绩纪念会编《那珂通世遺書》,[东京]大日本图书1915年版,第26页。

词来叙述与日本有关的内容。书中按中国“书法”叙事,是因为直录原文。冈本鉴辅在《万国史记》的凡例中写道:“清人书外国君主之死曰死曰卒,其例不一,今概曰卒,以从简约。其不得为帝为王者,直书其名曰死”(5)《万国史记凡例》。然而,该书在记述中国历史上皇位继承时,仍然沿袭中国史籍,称“(秦)二世为(赵)高所弑”(5)卷二,第4页;“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并吴,即帝位”(5)卷二,第6页,等等。

明治时期出版的汉文中国史著作中,绝大多数都继承了“春秋笔法”,即使是采用章节体叙事的那珂《支那通史》也不例外。那珂用“崩”、“弑”、“殂”、“卒”、“死”等来表现王朝的正统与僭伪。如那珂在《支那通史》第二卷《秦民离畔》一章中,引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内容,对秦始皇之死以及此后的皇位继替作了如下记述:“(始皇帝)得病而崩。李斯密不发丧,宦者赵高与李斯谋,诈为受诏书,立胡亥为太子,遣使赐扶苏、蒙恬死”(11)卷之二,第3页。“宋兵败溃,帝昺崩于海”等(11)卷之四,第46页),这类记述亦见之于其他明治汉文中国史。对于自幼接受儒学教育、熟读中国史籍的汉文中国史的编者来说,摆脱儒家历史叙事并非易事。

在儒学叙事的“书法”和“义例”问题中,最令明治汉文中国史的编者感到棘手的,是关于忽必烈两次派兵进攻日本的叙述。在《本纪·世祖》的相关记载中,多次使用“征”、“伐”、“击”、“讨”,仅“征日本”就出现了十八次^[1]。在13部汉文中国史中,下列6种中出现了有关元军出兵日本的记述。

【1】高丽王王睿领兵万人,水手万五千人,战船九百只,粮十万石,出征日本((1)卷之一,第5页)。

【2】至元十七年二月,日本国杀国使杜世忠等。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请自率兵往讨,廷议姑少缓之。……二十三年正月,罢征日本((3)卷之一,第2页、第6页)。

【3】(世祖)命范文虎等将兵击我大日本,大败,貽笑后世((5)卷二,第11页)。

【4】帝好远征,如云南、交趾、高丽、八百媳妇,连年用兵,悉皆臣服。又发大兵犯日本,北条时宗击破之,十万兵生还者仅三人而已((6)卷之六,第4页)。

【5】至元十七年春三月,帝如上都,复大发兵击日本(11)卷三,第28页)。

【6】(至元十七年)日本杀国使杜世忠等,忻都、洪茶丘请自率兵往讨。(十八年)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万人征日本。(中略)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12)卷一上,第10-11页。※“征日本”三字上方眉批“大军征日本”)。

在上面六段引文中,除藤田久道《汉土历代十八史略附三史略》书为“犯日本”外,其余四种皆书为“征日本”。在儒家叙事中,“征”表示战争发动者的正义性,其次指以上伐下。《礼记》云:“以征不义”(《礼记·月令》);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孟子·尽心下》)。反之,“犯”有“以下犯上”和“侵略”之意。《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说文》:“犯,侵也”。同一场战争,用“征”还是用“犯”来表述,其性质截然相反。“征日本”将元军出兵日本叙述为正义行为。在此种来源于中国史籍的历史叙述中,将当下的“日本”与镰仓时代的“日本”之间发生了断裂。反之,“犯日本”反向运用儒家的春秋笔法,将元军出兵描述为侵略行为,其非正义性便不言而喻了。在这里,编者对“日本”的民族认同超越了对儒家文化的认同^[2]。

[1]“(至元十七年)发大兵击日本。初帝屡遣使往通,日本不纳,乃命凤州经略使忻都伐之。无功而还。……(至元十八年)诏谕范文虎等以征日本之意。……诸军船为风涛所激,大失利。余军回至高丽境,十存一二”,《元史·本纪·世祖八》。

[2]除元军出兵日本之外,在台湾事件的叙述中,也有春秋笔法的反向运用。如“日本人伐台湾”(7)卷之十下,第21-22页),在此不一一列举。

无论汉文中国史的编者们是否认同儒家的“书法”和“义例”，只要文本中出现“征日本”三字，忽必烈出兵日本就被赋予了正义色彩。反之，引文【4】反向运用春秋笔法，以“犯日本”来对抗中国正史的历史叙述。“征日本”与“犯日本”仅仅一字之差，元军出兵日本便成了非正义的侵略行为。在明治时期出版的13部汉文中国史中，虽然“犯日本”仅此一例，但是，今天的读者还是可以从其中捕捉到作者的民族主义历史意识。

四、时空表述

时间和空间是历史叙述中不可或缺的坐标系。在当今世界，除少数例外情形外，人们在回顾人类历史时，已经习惯于用西历（基督纪年）来表示年代，以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等历史分期概念，以及“东方世界”、“东亚世界”、“欧洲世界”、“汉字文化圈”等空间概念来把握过去。然而，基督纪年和“文化圈”概念的普及，都是大航海时代以后欧洲势力向海外扩张的结果，在近代以前的东亚世界，长期以年号结合干支纪年，人们的对世界的空间把握，也是以中国为中心展开的。

西历和年号这两种纪年方法，一个是通体纪年法，一个是循环纪年法，前者将时间表现为从过去、现在延伸到未来的一条直线；后者则由于频繁的改元，时间仿佛不断回到零点，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年号除了表示时间的推移，更重要的是代表王权统治的正统性，“贞观”、“万历”、“乾隆”等特定的汉字组合，给时间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性。当几个政权同时存在时，史家使用哪一个王朝的年号，便赋予了该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其他政权则自动被归入“僭伪”之列。因此，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年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明治时期的汉学家们在书写中国的历史时，有四种时间坐标可供选择：中国年号、日本年号、神武纪年和西历。选用那一种时间坐标并非单纯出于个人偏好，而是意味着作者选择该时间系统来统摄中国历史。同样，书写日本史或西洋史时亦是如此。13种明治汉文中国史无一例外，皆使用中国年号。年号是王朝正统性的标志，中国人修史历来重视年号的选择，在几个政权同时存在时，选择其中某一个王朝的年号，意味着视该王朝为“正统”，以区别其他“僭伪”政权。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在中国年号后面夹注日本神武纪年或天皇年号，涉及其他国家时，另加注西历¹¹。

与此不同，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称“自东汉末年献帝即位（我850年），至隋灭陈之时（我1249年）之四百年间，可谓支那帝国纷乱动荡之时期”¹²。桑原鹭藏《中等东洋史》等东洋史则大多使用日本天皇年号或神武纪年。桑原在《中等东洋史》的开头部分就纪年问题作了如下说明：“时间之顺序皆用我国纪元，支那之年号略而不记，因其变更频繁，难以记忆之故”¹³。桑原强调，不使用中国的皇帝年号是因为中国的年号变更频繁而难于记忆，故而使用日本的神武纪年。如：“孔子，名丘，字仲尼，皇纪百十年生于鲁，倡儒教”¹⁴。田口和桑原都将中国史纳入到1873年创造的神武纪年的时间序列之中，这一选择表达了一个重要立场，即用日本时间统驭中国历史。

除了选用哪一种纪年法来表示年代，史家在书写历史时还遇到一个问题，即在西历等通体纪年法

【1】例如，那珂在叙述佛教传播时说：“教主释迦牟尼没于周景王二年（我纪元百十八年、西洋纪元前五百四十三年）”（11卷二，第40页）。

【2】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卷之四，〔东京〕秀英舍1888年合刊本，第244页。

【3】桑原鹭藏编著、那珂通世校阅：《中等东洋史》上卷，《中等东洋史辩言十则》，〔东京〕大日本图书1898年版，第3页。

【4】桑原鹭藏：《中等东洋史》上卷，第49页。桑原在记述其他国家的人物或事件时也一律使用神武纪年，如：“佛教之祖师名为乔答摩悉达，号释迦牟尼，中印度迦比罗城国王之子。生于皇纪四百年前后，孔、老二师殆与其同时也”。见桑原《中等东洋史》上卷，第110页。

中,人们难以确定事件或人物在时间轴上的具体位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方史家通常使用“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等历史分期概念,或者直接使用“维多利亚王朝”、“波旁王朝”等王朝的名称来表示时间。这样,时间被切割成一些短小的时段,装入一个个“时间之盒”后^[1],就不再难以把握了。与此不同,东亚世界长期使用的年号·干支纪年法,本本来就为史家准备了许多现成的“时间之盒”。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自古就以王朝为自然的历史分界。以王朝为基本单位的历史分期,蕴含了儒家“一治一乱”的历史观念。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在儒家看来,王朝的兴衰更替有一套规律,当统治者的行为符合天道时,王朝就会兴盛,反之则会衰亡,而天道具体表现为“仁”这一儒家道德标准中最重要的概念。王朝与王朝之间不存在进步、停滞或倒退这些概念。这与西方近代启蒙史学强调的人类由野蛮到文明之进步史观截然不同。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明治时期日本出版的13部汉文中国史著作,除了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采用上世、中世、近世的历史分期外,都仿照正史帝王本纪的体例,以历代王朝和帝王为主轴进行编年叙事。

那么,那珂在导入跨越以王朝为自然分期的新体例的同时,是否接受了西方的线性史观呢?那珂在《支那通史》的《总论》部分指出,书中的“上世”概念来自中国古代“唐虞三代”或“上三代”之说,具体指夏商周;“中世”又称“后三代”,指汉唐宋;“近世”即元明清三代,那珂称之为“近世三代”。那珂除了指出每个“三代”皆为“隆盛之朝”外,没有提示具体的分期标准。由此,宫崎市定认为,那珂历史分期的标准“似乎是出于重视一治一乱的周期的立场”,他比较《支那通史》和桑原鹭藏《中等东洋史》的历史分期,认为后者的标准更为明确^[2]。《支那通史》《总论》篇末尾部分的下面一段文字似乎印证了宫崎对那珂历史分期的批评:“以叙历代治乱分合之概略,庶几初学之徒,或得由以察我邻邦开化之大势矣”(Ⅱ卷一,第6页)。那珂虽然打破了传统的王朝史分期,导入“世”了这一新的“时间之盒”,但是至少在撰写《支那通史》这一时期,与其它汉文中国史一样,那珂的历史意识并没有摆脱儒家“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3]。

在空间表述上,明治汉文中国史受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的影响,都没有关于近代民族国家叙事中“国界”和“领土”的描述。唯一的例外是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该书开篇第一章《地理概略》概述了中国的疆域、地理位置、山川河流、人种等。在篇首叙述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识,受到须因顿的《万国史》等当时十分流行的欧美世界史教科书的影响,这是《支那通史》有别于其他汉文中国史的特点之一。然而,必须强调的是,与文明-进步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不同,在《支那通史》关于中国地理和人种的文字中,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观念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痕迹。那珂将中国的地理空间分为“支那本土”和“蕃部”(满洲、蒙古、回疆、青海、西藏)。在这片广大的疆域里,散居着“黄色人种”,其中包括支那种(汉人)、韩种(高丽)、东胡种、鞑靼种(蒙古与回)、图伯特种(西藏)和江南诸蛮种^[4]。那珂按照文

[1]佐藤正幸:《歴史認識の時空》,〔东京〕知泉书馆2004年版,第67-68页。

[2]《桑原鹭藏全集》第4卷,宫崎市定:《解说》,〔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755页,第763-764页。桑原根据汉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势力消长,将东洋史划分为上古期(“汉族膨胀时代”,从上古到秦统一中国)、中古期(“汉族优势时代”,秦统一中国-唐末)、近古期(“蒙古膨胀时代”,宋-明末)和近世期(“欧人东渐时代”,清初-)四个历史时期(关于桑原的历史分期,参见拙文《吾国无史乎?——从支那史、东洋史到中国史》,载孙江、刘建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

[3]在甲午战争前后,那珂的历史认识经历了由传统的治乱兴亡史观转向进化史观的转折,并影响到此后出版的东洋史教科书《那珂东洋小史》(大日本图书1903年版)的历史叙述。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外撰文讨论。

[4]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卷一,第4页。

明发达之水平,将中国境内的民族分为不同的等级:“当四邻皆纯夷之时,汉土独为礼乐之邦,政教风俗,已擅美于东洋,足以观古代开化之一例矣”。“韩种又名高丽种,今朝鲜人是也,文化夙进,亚于汉人。”而苗、獠、獠等“江南诸种”则“皆性极顽陋,在众夷中为最劣”^[1]。“诸胡皆无城郭常处,以畜牧射猎为业,贵壮贱老,不知礼义,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亦取(娶)其妻,故汉人贱斥,至以为犬猪之类。”^[2]《支那通史》的空间表述,可以追溯到19世纪自欧美传入的地理知识^[3],更可以追溯到儒家“内中国,外夷狄”的华夷观念。

与此不同,桑原的《中等东洋史》将中国置于东自朝鲜、西至印度、中亚的巨大而边界暧昧的“东洋”空间之中。桑原将东洋史分为上古(汉族膨胀时期)、中古(汉族优势时期)、近古(蒙古族最盛时期一)和近世(欧人东渐时期)四个时期。除了上古期的叙述中汉族高于周边以外,其余几个时期的叙述中,汉族于其他民族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它们都被置于“东洋”这一民族竞争的舞台之上。

《支那通史》中最具代表性的儒学历史叙事反映在古代中日关系的叙述上。那珂写道:“是时支那隆盛,古今无比。吐蕃、新罗、渤海诸国,皆被其风化。我邦亦学艺益进,旧俗日变,而钦仰支那,殆如上国矣”。在该书“中世史”部分《倭汉之通交》一节,记述了卑弥乎和倭国五位国王(瓚、珍、济、兴、武)派遣使向中国朝贡。

我邦之通于支那,不详其始。彼史曰:倭凡百余国。……又曰汉光武末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又曰:安帝初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此皆我土豪之私交也。三国时有女王卑弥呼者,遣使经魏带方郡,诣洛阳朝献。卑弥呼者,盖我西边女酋也。……宋齐诸史,叙倭王贡献之事,瓚之后有珍、济、兴、武四王,皆受南朝官爵。此四王者,反正、允恭、安康、雄略四帝也(II卷之三,第69-70页)。

上面这一段叙述以中国正史为底本,并不回避卑弥乎和倭国的五位国王曾经向中国朝贡的事实。日本显然被置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世界之边缘地位。这些内容不见于八世纪成书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也不符合明治政府的官方叙述^[4]。《支那通史》的日本古代史叙述与当时日本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相抵牾,自不待言。

结 语

青木富太郎在战时出版的《东洋学之成立及其发展》一书中指出:“在明治初年以前,由于我国处在支那文化的绝对影响之下,我国的支那研究是支那式的支那研究,其研究态度与支那学者、尤其是儒家研究支那时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5]。明治汉文中国史的编者们,自幼熟读儒家典籍,在文化认同和学术传承上,都属于青木所说的江户知识人之列。在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一些自幼在江户时代的藩校中接受儒学教育的知识人,与同时代的中国士大夫一样,不自觉地形成了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认同,其学术取向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从本文的考察来看,江户时代的学术传统不但没有因明治维新而戛然而止,相反,即使是在文明开化的鼎盛时期也方兴未艾,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以后。

[1][2]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卷一,第4-6页,第38页。

[3]《支那通史》的空间和人种表述,与当时在日本十分流行的一本美国高中地理教科书《米切尔新地理教科书》颇为相似,该书介绍地球上不同地区的地理、物产、人种、政治制度等知识,并按照“文明”发展程度将人类分成若干等级。在这部地理教科书中,Corea(Korea)和满洲、蒙古、西藏等被一并归入“The Chinese Empire”之中。A. Augustus Mitchell, eds., *Mitchell's New School Geography, A System of Modern Geography*, Philadelphia: E. H. Butler CO, 1872, pp.372-373.

[4]关于《日本书纪》和明治政府关于古代中日关系的叙述,参见拙文《自我想像中的他者:日本近代历史教科书的中國表述》,张仲民·章可编《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前引青木富太郎《東洋学の成立とその発展》,第144页。

甲午战争使中日两国的国力发生逆转,在普通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不但失去了昔日文化典范之光环,而且成为蔑视的对象^[1]。进入20世纪后,随着江户时期出身的汉学家们逐渐辞世,日本汉学界人材日渐凋零,汉文中国史亦退出了历史舞台。

本文开头提出,在明治日本的中国史叙事中,除了西方影响下的文明-进步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两种近代模式之外,还存在一种基于儒家史观的前近代历史叙事,即儒学叙事。从本文的考察可见,明治时期日本汉文中国史著作的内容主要来自历代正史的帝王本纪,因而详于政治、军事,而略于天文、地理、经济、文化等内容。严格说来,汉文中国史并不能体现中国传统史学的全貌。但是,就整体而言,汉文中国史在体例、文体和历史意识上都深受儒家历史叙事的影响,既不同于田口卯吉《支那開化小史》等文明史著作依据欧洲进化史观将中国历史描述为“停滞之史”;亦不同于桑原隲藏《中等東洋史》等東洋史著作将中国史纳入“东洋”诸民族竞争之史。

在本文考察的13部汉文中国史中,除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外,都承袭中国古代“直录原文”的修史传统,以中国史籍为“底本”(original),抄录或节略正史、《资治通鉴》、《十八史略》等编年体著作。站在西方影响下成立的近代学术体系中看,这些著作无论就体例还是历史意识而言,大都有古色苍茫之感。13部明治汉文中国史中,除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外,在今天其余几乎不为人知,其原因也正在于此。然而,如果不以西方学术体系为参照系,而是按照江户到明治这一自然时序,便不难从这些明治时期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汉文中国史著作之中,看到存在于明治史学中的另一种历史叙述,即儒家历史叙事。即使在被后人誉为“永远值得我国东洋学界引以为自豪的经典之作”的《支那通史》中^[2],也随处留下了儒家史学叙事的痕迹。如使用中国帝王年号、以春秋笔法叙事、基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叙述中国与周边的关系,等等。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所谓近代化是指在政治、社会、思想和语言等方面由差异走向“均质化”的过程。在明治时期,这种“均质化”的诉求表现为由政府规定和推广统一的语言——“国语”,以实现国民统合。按照近代民族-国家叙事的标准,日本人以中国史籍为“底本”、用汉文书写中国历史,可谓一朵奇葩,因为在中国史籍,尤其是儒家春秋笔法的制约下,日本编者们的身份认同——自我(self)和他者(other)的表述往往发生倒错。然而,如果将明治汉文中国史著作放到明治初年的汉学热、乃至长达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来看的话,这一现象并不难理解。佐藤楚材、那珂通世等汉文中国史的编者自幼接受儒学教育、长期浸润于汉文世界,他们“一从底本”,用汉文来书写中国历史,并以“无一字无来历”为标榜,这无疑给他们的著作盖上了权威的印记。必须强调的是,在文明-进步历史叙事和民族-国家历史叙事占据主导叙事(master story)地位之前,儒家历史叙事曾经长期主导日本人的历史叙事和自他认知,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甲午战争之后。汉文中国史著作的存在和流行提醒论者,在讨论“明治维新”、“文明开化”等问题时,应该避免落入西方近代学术体系的认识论窠臼。

[责任编辑:肖波]

[1]关于近代日本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观,已经出版了许多论著,在此不一一列举。但是,由于资料所限,其研究对象基本上集中于知识阶层。金山泰志的近著《明治期日本における民衆の中国観——教科書・雑誌・地方新聞・講談・演劇に注目して》([东京]芙蓉书房出版2014年版)通过分析教科书、儿童杂志、地方报刊、演剧等资料,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民众阶层,认为明治时期日本民众的中国形象在整体具有两个层面,一是对孔子等古代圣贤伟人的肯定,二是对现实中国的否定。以甲午战争为契机,日本的中国形象整体趋向负面。

[2]那珂通世著、和田清译:《支那通史》,和田清《序》,[东京]岩波书店1938年版。